

生命之光

中

夏衍◎著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

祖籍河南开封，生于浙江杭州。

夏衍是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

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青年读本

黄音通题



大众文艺出版社

青年读本

生命之光

夏 衍 著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之光/夏衍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4

(青年读本)

ISBN 7—80094—969—9

I. 生…

II. 夏…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1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1599 号

丛书主编:邓九平

策 划:张家勋

生命之光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 字数 357 千字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969—9/I·503

定 价:89.80 元(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目 录

人物篇

永远难忘的教诲	3
追念瞿秋白同志	15
韬奋精神永留人间	19
忆达夫	23
忆阿英同志	32
绀弩还活着	40
赞颂我的“老大姐”	45
纪念潘汉年	48
杨度同志二三事	61
风雨故人情	
——《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代序	64
忆健吾	
——《李健吾文集·戏剧卷》代序	70
为中国剧坛祝福	
——祝洪深先生五十生辰	75

悼念田汉	78
悼秦似	89
忆孟超	96
怀念章锡琛先生	100
于伶小论	107
小丁今年七十五	
——《丁聪漫画系列》代序	116
少了一个说真话的人	
——悼孙寒冰先生	118
不能忘却的纪念	121

回忆篇

家世·童年	127
旧家的火葬	141
从“辛亥”到“五四”	146
从香港回到上海	191
耕耘（节录）	250
高墙里的梦	270
迟到的春天	274
要忧国忧民	278
谈经验教训	282
关于“谈自己”	292
关于笔名	295

忆儿时旧梦	301
发生命之光	304
妥办身后事	309

杂文篇

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	313
《未晚谈》代序	317
野草	321
论“晚娘”作风	323
从杜鹃想起隋那	325
宿草颂	327
甲子谈鼠	329
论恭维	334
“废名论”存疑	336
从点戏说起	338
一木一石的精神	341
论肚子问题	344

叙事篇

左翼十年（节选）	355
“四一二”之后的上海	355
革命文学论战	371

筹备组织“左联”	381
“社联”、“剧联”等的成立	391
《文艺新闻》及其他	410
进入电影界	424
“左联”的后期	437
“怪西人”事件	455
在大的悲哀里	464
郭沫若回国	468

艺文篇

关于改编	491
关于电影	504
为电影诊病	510
关于剧本	531
关于杂文	545
关于诗	553
关于杂文随笔写作	556
关于“论创作”	564
关于报告文学	566
附：包身工	568

从香港回到上海

1949年5月6日，潘汉年、许涤新、我和沈宁一行四人，从香港搭乘一条挂巴拿马旗的货轮到了塘沽。到码头来接我们的是冯弦同志，他和汉年很熟，我和涤新则是初次见面。在海员俱乐部吃了饭，在一家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日就乘火车赶回北京。平津解放还不过几个月，天津街头还是那副败落的样子，但是随处都可以看到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标语，也不时能听到《解放区的天》和《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傍晚到了弓弦胡同15号李克农同志的住处，克农和我自1941年初在桂林分手，一转眼已经八年多了，相见甚欢，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刚坐定，克农就叫人来给我们拍照，他说：“我们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平见面了，应该摄影留念。晚上，他设宴为我们洗尘。自从离开香港，我们就听不到时局的消息，所以一到弓弦胡同，就先向克农要当天的报纸，一个“小鬼”拿来一个报夹子，又偏偏没有6日和7日的报纸，好不容易才从克农口中知道了“三野”已在5月3日解放了杭州的消息。克农是酒豪，拿出一瓶据说是美国人送给他的陈年威士忌来殷勤劝酒，但我们三个人都不会喝酒，结果是他自酌自

饮。谈了不久前刚从香港回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人的情况，和与国民党谈判的花絮，他忽然想起似的指着我说，你的“老部下”金山在这次谈判中立了功，详细的情形让他向你们谈吧。久别重逢，话是讲不完的，这顿饭吃到11点钟才散，最后他说，前几天陈毅来电，围攻上海的战役已经开始，你们在北平的日子不会太久，从明天起，你们就别想休息，今晚好好睡一觉吧。

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区，什么“规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钱可以向后勤部去领，住旅馆、叫汽车可以不必付钱，一切都由“公家”供给等等，好在潘汉年是老手，所以向组织部报到，向中央汇报香港情况之类的事，都由汉年去安排。我只请李克农给我和廖承志通了一个电话，想让沈宁寄住在他家里，以便我轻装南下，承志很高兴地同意了。

第二天，我们就住进了北京饭店三楼（现在的中楼），记得潘汉年住的是303号。（事情也真巧，1955年4月底，潘汉年被捕，也住在这个房间。）

正如克农预料，这之后的日子果然忙得不可开交。为公，我们南下之前，必须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为私，我们三个人都想和阔别多年的朋友们见见面，叙叙旧情，和了解一下他们的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前者一切都由汉年去联系，过了一天，汉年就初步拟定了一个日程，他说，

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同志都在香山，工作极忙，所以接见的日期要挤时间，由中央办公厅决定后临时通知。恩来同志则在城里，明后天就可能约见，所以还有一天我们可以自由活动。吃了早饭，我和汉年先到中央组织部，简单谈了一些香港的情况，然后又一起到了弓弦胡同，我急于想知道几位熟朋友的地址，以便抽空去拜访，克农就要秘书给我抄了一张郑振铎、周扬、袁牧之、金山、萨空了等人的住处和电话号码的单子。我问他钱杏邨现在哪里，他说钱被黄克诚留住任在天津，但他本人很想回南方工作，假如你想见他，我打个电话要他来看你就是了。当天下午我到前能寺 16 号去找周扬，我和他 1946 年在上海分手之后，也已经三年不见了，要谈的事很多，记得那天谈的主要是当时还在大后方和香港的文艺工作者的情况，因为恩来同志已经决定，要尽快召开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的会师会议（即后来在七月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所以他要我开一张能出席这次会议的大后方文艺工作者的名单。话还没有谈完，汉年就派车来接我，说晚上朱德同志约我们吃饭。

回到北京饭店，“朱老总”已经在 303 号和汉年、克农、涂新聊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被斯诺、史沫特莱描写成传奇性人物的将军，这一天他穿着一身深色粗呢中山装，热情地站起来，像见到老朋友似的和我握手，第一句话是：“早知道你的名字了，不容易啊，你们这些文化人。”我仔细端详着他，平易纯朴，真不像是一位叱咤风云，指挥百

万大军的大将！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记得1947年冬，我曾在《华商报》写过一篇《祝福您，朱总司令》的祝寿文章），但显得意外的壮健、年轻。他请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并不比香港差的西餐，饭后喝咖啡的时候，李克农还讲了一个笑话，说国共谈判的时候，张治中将军请共方工作人员吃西餐，饭后他问一个通讯员好不好吃？回答是西餐很好，只是最后的一杯“药”（咖啡）实在太苦，朱德同志哈哈大笑，对服务员说：我们这些人不怕苦，再来一杯苦药。

金山、袁牧之相继来访。金山谈了许多国共谈判中的花絮，及1946年接管“满影”的经过。牧之则告我钱杏邨已从天津到京，并已约好次日上午来访。

11日晚，恩来同志约我们三人到设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华北局见面，由汉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各民主党派在香港召开代表会议的经过，其中有一段是李济深先生离港时的惊险情景。恩来同志对接管上海工作作了很具体的指示，并告诉我们，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协助曾山同志接管财经，我则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谈到近11点，恩来同志用他的车子送我们回北京饭店，路上，他忽然想起似的说：前两天邵力子和他谈起钱昌照的事，问我钱是否还在香港；我回答：我和钱谈过两次，资源委员会的物资和技术人员他已作了安排，我

离港后由乔冠华和他保持联系。恩来同志说这是一件大事，明天就电告乔冠华请钱早日回来。

12日一早，钱杏邨来访。我于1937年冬离开上海，已和他阔别十二年了，他先在上海办书店，编杂志，写剧本，太平洋战争后他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后来又随军到了苏北、山东，解放战争时期他又从威海卫到了大连，1949年东北解放后他才拖儿带女到了天津。经过这一段艰苦的战时生活，他还是精神抖擞，健谈如昔，但是他一再说，老了，手脚不轻便了，其实，他和我同年，这一年都是四十九岁，当然，他在战地跋涉了八九年，备历艰辛，所以我说，你身体上受折磨，可是思想上的收获可比我大得多了。他不忘故人，居然还送给我一本广州出版的我翻译的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和一本桂林出版的《愁城记》，他说这是在大连和天津的旧书铺里找到的。接着，金山、袁牧之来，我们一起到东单的一家小馆子里吃了午饭。下午，接到通知，中央负责同志将在香山接见我们，要我们晚8点以前到香山某一别墅，记得陪同我们去的是王拓同志。

晚10时，毛主席单独接见了我们，主要是听取潘汉年关于香港工作的汇报，当时，正是英国紫石英号在南京肇事之后，所以他问起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回答，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前，港英当局还怀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把李任潮留在香港；后来我军胜利渡江，南京解放，他们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我

们公开举行庆祝解放南京的酒会，他们也没有干涉，还让一些“太平绅士”参加了我们的酒会。至于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在我们离开香港之后，所以这之后他们的态度有没有改变，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笑着说：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看来他们是会留有余地，不会把棋走死的。我们请他指示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他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给陈、饶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做法，可以按周恩来同志给你们的指示办理。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最后对我说，关于文化方面的事，少奇同志最近去天津视察了一下，有些要注意的事，他会具体地和你们交代的。毛主席情绪很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的插话，使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也把汉年叫做“小开”。

原先决定在香山住一天，等少奇同志接见，可是第二天一早就接到通知，说周恩来同志决定当天晚上在中南海开会，我们三个人都要参加，所以吃了早饭就赶回北京饭店。周恩来同志约定的时间是晚上9点，所以我抽空就到护国寺附近的麻花胡同（？）去找廖承志，见到了何香凝先生、经普椿和李湄。沈宁在香港时和李湄同在培侨中学念书，亲如姊妹，所以把她寄托在廖家，生活、上学等等，一切都请“肥仔”全权处理。

晚8时，和汉年、涤新一起到了中南海，是勤政殿还是

别的什么殿，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这是平生第一次到了皇帝住过的地方，茅盾、萨空了、胡愈之已经先到，接着周扬、袁牧之、钱杏邨、郑振铎相继到达，大家都是熟人，只有沙可夫是第一次见面。大多数人都是久别重逢，而且，除许涤新是经济学家之外，都长期从事文艺、新闻工作，所以对解放后的文化事业，各有自己的抱负和设想，大家谈得十分高兴，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直到周恩来同志打电话来通知，说他正在和几位民主人士谈话，可能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到会，要我们暂时等待，这时看了一下表，才知道已经近10点了。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每个人都有许多话要说，都有许多事想问，所以尽管劳累了一天，谁都希望有这样一个交换意见的机会。周恩来同志大约快12点钟才赶到会场，他先向大家道歉，说他迟到了两个小时，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今天约大家来，是想对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听听各位的意见，第一是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中央决定要在政协开会之前，开一个文艺界的代表大会，目的是解放区的和大后方的文艺界会师，加强团结；第二是今后的新闻工作问题，特别是新解放区的办报方针，和如何对待民办报纸的问题；第三是上海即将解放，汉年等人很快就要南下，想听听大家对解放后上海文化工作的意见，因为上海是最大的文化中心，情况又比较复杂，今天在座的又都长期在上海工作过，所以希望大家对这项工作提点看法和意见。

对第一个问题，周扬、沙可夫先报告了对文代会的筹备经过，我也把周扬要我开的一张当时还在香港、上海和西南一带的文艺家名单交给了恩来同志。茅盾、振铎相继发言，谈的都是文学方面的事，钱杏邨作了补充，谈了戏剧和民间文艺的情况。然后恩来同志讲话，大意是说：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单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甚至反对过我们的人也要团结，只要他们现在不反共、不反苏，都要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该敌视他们，假如简又文、王平陵还不走，也要争取他们，团结的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这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今天在座的都是新文艺工作者，新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团结旧文艺工作者，可以肯定地讲，旧文艺工作者（一般所说的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当然，新文艺工作者内部，也还有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问题。最后，恩来同志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决策，少奇同志不止一次和我谈过，要花大气力团结旧艺人的问题，特别是京剧和地方戏艺人的问题。（1978年文化部退回给我的文物和我的笔记本中，居然还找到了一本当时的札记本，以上恩来同志的指示，是确切无误的。）



谈完第一个问题，已经是午夜1点钟了，暂时休息，吃了宵夜，然后谈新闻工作的问题。周恩来同志请胡愈之、萨空了坐在他的身边，以亲切的口吻说，我们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之后，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像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为此，要请你们这几位办报有经验的人给我们出主意，提意见。按解放前那样办当然不行，办成解放区那样，读者也会不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此外，还有一个民办报纸的问题，像《大公报》、《申报》、《新闻报》、《新民报》，以及党领导的外围报纸，这是一个相当复杂、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我们初步的意见是北平、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具体办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国民党的党报，当然要接管改造，但是从业人员，还是要分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这个问题要特别慎重，不能鲁莽从事。愈之，空了和我都谈了一些想法，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谈到第三个问题，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周恩来同志建议休息十五分钟，到外面去散散步。前一天下了一场雨，中南海的空气，特别凉爽，周恩来同志对我说，抗战前你在上海工作了十年，这之后一直在蒋管区，熟悉大后方情况，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到上海去主管文教工作，全国解放后，你有什么打算？我想了一下说，我在大学学的是电工，还是让我回本行吧。他摇了摇头，笑着说，不行了吧，丢了

二十多年，学过的东西都忘了吧。我争辩说，落后了，可是和全外行比起来，总还可以……他说当然也可以考虑，但是我看你还是搞文化、新闻界的统战工作为好。回到会议厅，接着谈上海解放后文化——主要是文艺方面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先让潘汉年讲上海的一般情况，和我们在香港时对这一工作的设想和布置，例如党内通过刘长胜，党外通过张骏祥，让地下党和进步文化界安排的“应变”措施等等，我作了一些补充，振铎谈了必须大力保护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问题。时间已经不早了，来不及详细讨论，我记得周恩来同志作结论时只讲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总的方针一定要严格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办事，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学会我们不懂的事情，对文化教育等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那里有许许多多学者专家，还有许许多多全国闻名的艺术家、名演员，所以要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他问杏邨和我，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是不是都在上海，你们到了上海之后，一定要一一登门拜访，千万不要随便叫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新文艺工作者大得多；二是除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外，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的工作人员，除极个别的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但一定要事先做好思想工作；三是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请你们把这